

文化渊源和学术传统转向上,基于新左派历史语境的变迁与国际史学思潮的学术嬗变,先后推出了丰富的学术论著与研究成果,分别在研究主题的社会文化意义和分析视域的史学范式转换上有新的拓展与形态。在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区域分布与动态演变中,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变动兴潜与流变趋势大多经历了从突破个体生存困境到形成群体发展规模的逻辑进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亦不例外,无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实践行动,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当代史学传统的理论塑造,都仍然受到英国史学界及国际史学界的重视。

## 百年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转向理路\*

徐 良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在美国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是美国激进主义史学传统的典型代表。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前后经历了两次高潮和两次低谷。总体而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高潮期,而“和谐一致论”史学盛行的50年代和苏东剧变的后冷战时代则无疑成为其发展史上的低谷期。在此过程中,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转向,对美国史学研究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厘清百年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转向理路,有助于理解与认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旨趣及其深远影响。

### 一、马克思主义劳工史与黑人史书写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美国工人运动的高涨,美国出现了一批关于劳工史、黑人史的作品。<sup>①</sup>总体上看,它们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其观点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色彩。十月革命后,随着美国共产党于1919年9月正式成立,一批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政治家和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剖析、批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尖锐的社会问题,从而推动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式形成。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当时工人运动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以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 1881—1961年)、菲利普·方纳(Philip S. Foner, 1910—1994年)、威廉·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1868—1963年)和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 1915—2003年)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著书立说,在批判康芒斯—威斯康星学派及种族主义黑人史研究相关思想的基础上,<sup>②</sup>构建了全新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和黑人史。这两个领域也成为20世纪上半期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最高、成果最丰硕的研究领域。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百年流变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3ASS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Richard T. Ely, *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Thomas Y. Crowell, 1886; John Rogers Commons et al.,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Macmillan Company, 1918; Ulrich B. Philips, *American Negro Slavery: A Survey of the Supply, Employment and Control of Negro Labor as Determined by the Plantation Regime*, Appleton, 1918.

② 约翰·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 1862—194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劳工运动史学家,1904—1923年任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美国早期工人运动史学的主要学派“康芒斯—威斯康星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该学派否定美国工人阶级具有阶级意识,鼓吹劳资利益一致等观点。

作为美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先后出版了许多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著作,如《罢工的策略》(1926年)、《产业工会指南:组织结构和策略》(1937年)、《一个工人的生活纪录》(1939年)等。受当时共产国际对阶级斗争日益加剧判断的影响,在美国国内因大萧条导致工人失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形势下,福斯特强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宣传了美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原则等。与康芒斯—威斯康星学派认为美国工人阶级只有“职业意识”“不可能有什么阶级意识”的观点不同,福斯特强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并倡导通过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三种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国家。<sup>①</sup>

菲利普·方纳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出版过多部著作,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美国劳工史、黑人史等领域,<sup>②</sup>代表性作品包括《商业与奴隶制:纽约商人与不可抑制的冲突》(1941年)、《美国工人运动史》(1947年出版第一卷)等。在劳工史方面,方纳与福斯特一样,对康芒斯—威斯康星学派的实用主义劳工运动理论展开了犀利批评。他指出,在康芒斯等人笔下,所谓劳工运动只是关于如何组织工会并使其策略适应“环境”的一种实验过程,过去劳工阶级进行的政治斗争都因不适应美国的“特殊环境”而失败了,美国的劳工组织应采取的唯一聪明的政策是无党派政策。方纳对此表示反对。在他看来,要理解美国工人运动,必须着重考察劳工对美国民主运动成长的作用。工人阶级为美国民主政治做出了较大贡献,但能够见到的历史作品却很少提及他们,而他要做的就是为这些倍受忽视的人做详细的历史记载。<sup>③</sup>福斯特和方纳的劳工史书写扭转了早期美国劳工史书写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观念,他们把工人运动看作是为促进美国社会的自由与平等而进行的伟大政治斗争,赋予劳工史以全新的时代价值和积极意义。他们的历史书写符合那个时代的现实需求,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黑人史研究方面,杜波依斯和阿普特克做出了重要贡献。前者的代表作品有《美国黑人的重建》(1935年)、《黑人的过去和现在》(1939年)、《世界与非洲》(1947年)等;后者写出了《内战中的黑人》(1938年)、《美国黑奴的起义》(1939年)、《美国革命中的黑人》(1940年)、《废奴运动中的黑人》(1941年)等一系列伟大作品。早在内战前后,美国就出现了许多讨论奴隶制和黑人问题的著作,但在马克思主义黑人史学出现前,大多数黑人史著作带有偏见,对黑人及其文化抱持轻蔑和歧视的态度。这些作品服务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府扼杀黑人解放运动的现实需要,对黑人历史进行了肆意歪曲。它们把白人奴隶主描述成温和善良的主人,黑人则是天生低劣、忠实温顺的奴隶,从未创造过任何形式的文明成果。种植园是黑人最好的学校,黑人在种植园学会了纪律和劳动。20世纪30年代后,以杜波依斯和阿普特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开始重新书写黑人的历史,对传统种族主义黑人史学展开了猛烈抨击。

作为20世纪著名的黑人史学家,杜波依斯怀揣振兴黑人民族的雄心壮志开始了他的黑人史书

① 姜琦、张月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党际关系史(1848—198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李东明:《威廉·福斯特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6—198页。  
② Sally M. Miller, “Philip Foner and ‘Integrating’ Women into Labor History and African-American History”, *Labor History*, Vol. 33, No. 4, 1992, p. 456.  
③ 菲利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黄雨石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页。

写。他反对布克·华盛顿关于“黑人只要拥有智力、财产和品格就能解决公民权利问题”“黑人应放弃争取权利,远离政治”的观点,提出了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激进斗争路线。杜波依斯认识到,黑人问题的根源在于私有制造成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经济歧视是黑人问题最突出的方面。<sup>①</sup>他明确提出,政治权利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黑人必须努力建立一个“经济国中国”才能争取生存权利。大萧条后,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杜波依斯在探索破解黑人命运难题方面逐步向社会主义靠拢。他强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黑人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黑人解放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主义。<sup>②</sup>他的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黑人民权运动。

作为美国历史上少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美国黑人历史的白人学者,阿普特克以研究奴隶起义著称,其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美国黑人奴隶的反抗与斗争史的书写。与杜波依斯一样,阿普特克对种族主义史学家描述的奴隶对奴隶制度是“忠顺的”“满足的”神话不屑一顾。他指出,在奴隶主的剥削压迫下,奴隶们对奴隶主和奴隶制度从一开始就展开了暴力反抗,每一次奴隶起义都可以视为奴隶们对不平等社会制度集体抗议的表达,产生了重要经济和社会影响。<sup>③</sup>阿普特克的黑人斗争史书写对学术界和社会大众产生了广泛影响,以至于有学者指出,“阿普特克的作品使人们越来越难以忽视美国境内的黑人的历史”。<sup>④</sup>

美国学者肯尼斯·斯坦普指出:“南部黑人奴隶制研究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史学家的偏见。”<sup>⑤</sup>如果我们用这一观点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前的美国劳工史研究,显然也是合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劳工史和种族主义黑人史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偏见的产物,被人们称为“老左派”的第一批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马克思主义中不仅汲取了分析理论和方法,更获取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他们的史学作品像澎湃激昂的战斗檄文,对主流学术界构成了巨大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当时美国劳工史和黑人史研究中的偏见。他们坚持为主流史学界不屑一顾的工人、黑人发声,促使人们关注美国社会历史中的不公平现象,其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 二、“新左派”史学的美国外交史研究

随着冷战爆发,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盛行,美国共产党受到打压,一些左派学者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由此进入一个短暂的低谷期。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亚非拉地区的反帝反殖斗争如火如荼,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重焕生机。与此同时,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等在美国国内相互激荡,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抗议洪流。在此背景下,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开始在美国史坛成长起来。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的“老左派”不同,新马克思主义者在远离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走向了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Methodological Marxism)。换句话说

① W. E. B. Du Bois, *Darkwater: 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 Harcourt, Brace and Howe, 1921, pp. 99-100.

② W. E. B. Du Bois, *Autobiography of W. E. B. Du Bois: A Soliloquy on Viewing My Life from the Last Decade of Its 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 Inc., 1968, pp. 57-58.

③ Herbert Aptheker, *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p. 233.

④ Herbert Aptheker, *To be Free: Pioneering Studies in Afro-American History*, Carol Publishing Group, 1991, “Introduction”, p. 5.

⑤ Kenneth Stampp, “The Historian and Southern Negro Slave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7, No. 3, 1952, p. 613.

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源于分析,而非政治,<sup>①</sup>因此被人们称为“新左派”。他们反对50年代为冷战服务的“和谐一致论”史学家对美国历史做的涂脂抹粉式的书写,也不满意“老左派”史学家对美国历史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描述。在史学研究中,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理论和方法对资本主义发展与美国社会的变化展开了深入剖析,试图在美国建立一个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美好社会。

劳工史和黑人史研究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新左派”史学家在这两个领域继续耕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尤金·多米尼克·吉诺维斯(Eugene Dominick Genovese)的奴隶制研究和艾伦·索尔根尼克(Allen Solganick)等人的劳工史研究。但与此相较,在冷战危机重重和越战硝烟弥漫的时代背景下,自称“新左派”的新一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关注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关系问题。因此,美国外交史成为其研究的重中之重,取得的成就也最大。这标志着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新阶段发生了重大转向。美国传统外交史学的最大特征就是从理想主义出发,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行为涂脂抹粉。在塞缪尔·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等美国传统外交史学家们看来,一部美国外交史就是美国力量不断增长,向外推广民主思想,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与此相反,“新左派”史学家们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从经济因素分析入手,深刻批判了美国自建国以来所推行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本质,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由于他们对美国外交所持的观点与传统史学家们截然不同,因此又被人们称为“修正主义者”,他们的史学也被人们称为“抗议史学”。

“新左派”史学家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首先源自他们对冷战的恐惧与厌恶。20世纪50—60年代,美苏冷战的乌云笼罩着每个美国人的生活,热核战争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让人们生活在惊恐之中。于是,到底是谁引起了“冷战”、谁应该为之负责的问题成为学者和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焦点。传统美国外交史学家站在美国政府一方,指责苏联应该为“冷战”负责。在他们看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狂妄自大、俄罗斯民族的扩张主义传统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识形态共同导致了“冷战”发生。与他们不同,“新左派”史学家们把批判矛头指向美国,认为美国才是“冷战”真正的罪魁祸首。威廉·阿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1921—1990年)被人们视为“新左派”史学的奠基者和“威斯康星外交学派”的创始人。早在1952年和1959年,他就出版了自己的两部关于美国外交的力作《美俄关系:1781—1947》和《美国外交的悲剧》,对“冷战”起源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他指出,在面对“冷战”这一问题时,人们通常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本能地指责苏联应该为“冷战”负责。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单纯的民族主义;二是认真地进行自我反省,找出事实真相,而不是去刻意歪曲它。<sup>②</sup>在他看来,美国政治家头脑中长期存在的对苏敌视观念和对扩张海外市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追求,是导致“冷战”最终发生的两个主要因素。<sup>③</sup>两者相较,为缓解国内经济压力和促进经济发展而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又是“冷战”爆发最根本的原因。<sup>④</sup>作为威廉斯的学生,沃尔特·拉菲伯(Walter LaFeber, 1933—2021年)等人也把“冷战”的主要责任归咎于美国。他们指出,美苏两国的社会制度差异并不是“冷战”的主要原因。“二战”后,美国力图建立一个“门户开放”的世界的传

① Q. Edward Wang, Georg G. Iggers, eds., *Marxist Historiograph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Routledge, 2016, p. 42.

② W. A.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Dell Pub. Co., 1962, p. 207.

③ W. A.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pp. 207 - 230.

④ W. A.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pp. 18 - 21.

统政策与苏联的国外掌控要求间的明显冲突才是“冷战”发生的最主要原因。<sup>①</sup> 他们指责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海外经济扩张建立一个经济帝国,以寻求广阔的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并维持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

如果说“冷战”责任问题是美国“新左派”史学家对美国外交展开激烈批评的触发点,那么“门罗主义”“美西战争”“一战”和“二战”等成为他们从历史的维度批判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点。在威廉斯和他的众多学生们看来,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传统外交史学家笔下带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孤立主义”国家,而是一个自始至终崇尚扩张的国家。他们指责美国的帝国主义,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直接导致了它的对外扩张。在他们看来,19世纪晚期“美西战争”后,美国面临两条道路的抉择:一是通过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来重建其制度,这条道路不需要对外经济扩张;二是通过寻求海外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来维持工业联合体的发展,即“门户开放”道路。最终,麦金莱以后的美国领导者选择了后一条道路,部分原因就是通过对对外扩张维持国内发展,同时消解可能发生的国内改革。在“新左派”史学家的词典里,“门户开放”政策就是“帝国主义”的同义词。这一政策在美国的对外扩张发展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直接导致后来美国参加“一战”和“二战”及与苏联的“冷战”。<sup>②</sup>

纵观“新左派”外交史学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年轻一代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美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扩张主义外交政策间建立了一条清晰严密的逻辑链条。在他们看来,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体系具有天然的扩张本性,从而导致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外交政策就具有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本质特征。美国的扩张主义外交政策在给美国带来一定经济利益和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会导致美国与其他大国间的争斗,引起一些弱小国家的反感。扩张主义外交引起的战争是与人类追求和平与正义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严重破坏了美国形象。为此,他们呼吁美国领导者着眼于国内改革,解决好自身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从而创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公正”的理想社会。

在美国历史上,“新左派”史学家并不是第一批站出来批评美国外交的人,但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对美国外交扩张主义本质的揭示与批判却是最犀利、最系统、最让人振聋发聩的。在“让人恼火”的越南战争的背景下,“新左派”史学家的作品有着广泛的吸引力。正因为此,与“老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无法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认可不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越战运动不断高涨、“冷战”危机日趋加重的时代背景下,“新左派”史学家们的作品在美国社会受到广泛关注,并逐步被美国主流学术界接纳,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浓烈的现实关怀,改变了当时美国保守主义史学对美国历史的歌功颂德式的书写模式,提升了人们的反思意识,开阔了社会大众视野,不仅为美国史学发展注入了新激情与活力,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 三、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跨学科转向

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遭遇“寒流”,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也陷入空

<sup>①</sup>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75*,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6, pp. 1-2.

<sup>②</sup> Ole R. Holsti, “Review of New Left Diplomatic Histories and Historians: The American Revisionist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8, No. 4, 1974, p. 1879.

前低落。但是,21世纪以来,“回到马克思去”的新激进主义思潮不断在东西方出现,世界范围内甚至出现了“马克思热”。<sup>①</sup> 2008年从美国开始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越来越多美国人意识到美国经济和社会存在的诸多隐患,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增强。在此背景下,学者与社会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激增,全球性的收入不平等、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及全球化浪潮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倍受关注,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问题及其当代意义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焦点。这一时期,受史学社会科学化浪潮的影响,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跨学科转向,产生了许多新观念和新思想,探寻当今美国和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多重危机的成因及其解决之道成为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目标。

苏东剧变后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着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1991年,亨利·迈耶(Henry Meyer)发表了《塑造世纪的思想家》一文,坚持认为“马克思是让人们懂得20世纪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正是他对资本主义做了最好的分析,不论人们愿意接受与否,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融分析、市场调查、投资预测,直到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分析,都仰求于马克思的思想。<sup>②</sup> 同年,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也在其《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依然有生命力。<sup>③</sup> 1997年,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等学者出版了《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一书,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立场上,对1960—1990年间美国阶级结构的转变进行了深入考察,为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及其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sup>④</sup> 2006年,布拉德利·麦克唐纳在其出版的《实践马克思:一种活的传统的当代对话》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人们在实践马克思主义方面面临着两种抉择:一是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使之与当前社会现实完全脱离,最终成为一个死的传统;二是根据当今时代发展的新情况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持续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活的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他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实践相联系,才能有效践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中才能对当今社会变革继续发挥指导作用。<sup>⑤</sup>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理论,如罗耀拉大学的大卫·施威卡特(David Scheickart)、布法罗大学的詹姆斯·劳勒(James Lawler)和纽约大学的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等人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认为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实现,市场经济都要继续存在。市场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sup>⑥</sup> 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俄勒冈大学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人发展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马克思是生态批判理论的先驱者和开拓者,马

① 陈学明、王凤才主编:《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95页。

② 山风摘译:《美国学者谈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现状和前景》,《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14期。

③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桥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④ 埃里克·奥林·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陈心想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⑤ Bradley J. Macdonald, *Performing Marx: Contemporary Negotiations of a Living Tradi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p. 27 - 35.

⑥ 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克思的世界观包含着系统的生态思想。<sup>①</sup> 福斯特指出,全球正处于严重的环境危机中,世界生态正以超出人类控制的规模和速度恶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和环境间的关系出现了断裂,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进入了死胡同,为此需要进行一场总体性的“生态革命”。<sup>②</sup> 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同一革命的两重价值属性。生态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革命则是生态革命的制度保障。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和生态革命,才能解决所有面临的问题。<sup>③</sup>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变革不合理不科学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才能在生态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自然、人、社会三者的和谐共生与辩证统一。<sup>④</sup> 此外,还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对种族冲突和女权主义的分析,力图揭示美国社会存在的诸多不公正、不平等的本质,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如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的特蕾莎·艾伯特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女权主义的再物质化》的文章中指出,当前流行于女权主义理论中的“文化转向”脱离了性和性别问题的物质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相关理论,“文化”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在本质上是经济基础和物质关系的社会表现。因此,仅通过文化斗争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整体变革的,实现社会变革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只能是阶级斗争。<sup>⑤</sup>

总体上看,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与以前大不相同的鲜明特征。首先,史学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化。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跨学科研究趋向的影响,这一时期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关研究不再拘泥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而借用了诸如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手段更加丰富,对相关问题的探究也更加深入。其次,史学研究的视野更加宏阔。劳工史、黑人史及其他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困境可以说一直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但“后冷战”时代以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再局限于对传统主题的研究与书写,而在马克思主义面临全球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着力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并注重从辩证多维的角度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剖析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及其遇到的新问题。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鲜活的生命力无疑是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任务。最后,史学研究的队伍更加泛化。与此前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有着明确的史家身份不同,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构成更加多元。受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影响,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不断涉足史学研究领域,在学术研究中注重把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不断扩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和维度,极大地改变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原有面貌。尽管有如上诸多不同,但在史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上,今天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此前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史学家们关注当代美国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试图从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的

- 
- ① Brett Clark,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1, 2010, p. 142.
- ②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 viii; John Bellamy Foster, “Organizing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Vol. 57, No. 5, 2005, pp. 1 - 10.
- ③ 马健永:《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统一——基于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宁波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 ④ 贾学军:《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页。
- ⑤ Teresa L. Ebert, “Rematerializing Feminism”, *Science & Society*, Vol. 69, No. 1, 2005, pp. 33 - 55.

“钥匙”和“指南”，因此具有深刻的现实性。这也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传承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

### 结 语

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跌宕起伏百余载。纵观百年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无论被称为“老左派”的第一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以“新左派”著称的第二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抑或是“后冷战”时代以跨学科研究见长的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的史学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学术目标,即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对美国和分析,尤其是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百年来,在追求这一学术目标的历程中,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社会变迁和史学流传的影响下不断发生转向,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性特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萧条的时代背景下,第一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注工人阶级和黑人等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修正了传统美国劳工史和黑人史书写中的偏见和不足,书写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史和斗争史;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冷战”阴云密布和越战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第二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开始把自己的研究重心转向美国外交史。他们从经济因素入手,系统批判了美国外交自建国起就具有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及其对美国的影响,颠覆了美国传统外交史学家们对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的阐释。从国内问题到对外关系问题,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实现了第一次重要转向。“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经历短暂低谷后,很快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尽管美国共产党在21世纪初只有大约一万五千名党员,<sup>①</sup>但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国受到广泛关注。在跨学科方法的引领下,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断强化反思意识,注重思考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特征及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等问题。跨学科研究拓展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改造功能和时代价值,标志着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新时代完成了极其重要的又一次转向。总体上看,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每一次转向都切合时代脉搏,着眼于促进不同时代的社会革新与进步,突出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苏联学者阿·波列塔叶夫在菲利普·方纳的《美国劳工运动史》“俄译本序言”中曾经写道:“美国历史的真正研究首先是从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的。他们提供了了解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美国社会发展中那些最重要问题的关键,揭示了美国阶级斗争的特征,暴露了作为进步与民主的最危险敌人的美国资产阶级的残暴面目。”<sup>②</sup>今天看来,虽然此论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关于“美国历史的真正研究首先是从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的”的论断也难免有些武断,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确实在剖析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现实问题、促进美国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同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史学书写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史观上

① 王学东:《美国共产党的现状与前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4期。

② 菲利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黄雨石等译,“俄译本序言”,第3页。



都对美国的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sup>①</sup>从这个角度看,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百年来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理路探赜\*

王格格 (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萌芽于明治末期,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以科学性、阶级性、客观性的问题意识及方法论,不仅对日本史学发展产生广泛影响,更由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引介、改造与突破,在中国思想界产生重要反响,推动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学界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一定关注,现有研究或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日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一部分加以考察,<sup>②</sup>或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事件、流派、成就与缺陷分而论之,<sup>③</sup>亦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传播和发展的论述。但总体上看,既有研究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的脉络梳理仍有补充与完善的空间。<sup>④</sup>因此,整体透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审思其学术思想嬗变,对深入理解近代以来日本史学的学术动向和加强中日史学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 一、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

日本近代最早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文明史学”在诞生初即表现出唯物论倾向。1875年,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从物质条件方面来说明社会变动和发展原因,提出了实现文明的方法论。然而,“文明史学”在文化观念上仍以“西方中心论”为中心,存在服从既定观念、以论代史、重宏观轻微观等根本缺陷。自由民权运动兴起后,田口卯吉等有识之士主张打破“西方中心论”,运用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为自由民权运动提供理论支持的同时,批判经济专制,强调货财与人心的“物心二元”的自由经济价值。田口史学对社会存在阶级关系已有一定认识,特别重视社会经济基础,以大米行情

① 美国学者威廉·卡里根(William D. Carrigan)曾全面分析了马克思对美国 and 北美史学书写的重要影响,参见 Q. Edward Wang, Georg G. Iggers, eds., *Marxist Historiograph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pp. 40-55。

\* 本文为“首届全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青年论坛”参会论文,对会议评论人及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深表感谢。

② 代表性论著有,遠山茂樹『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岩波書店、1968年;沈仁安、宋成有:《近代日本の史学 and 史観》、《日本史论文集》,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1982年版;坂本太郎:《日本の修史 and 史学》,沈仁安、林铁森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永原庆二『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吉川弘文館、2003年;张经纬:《试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成田竜一『近現代日本史と歴史学』、中央公論社、2012年;户边秀明:《马克思主义 and 战后日本史学》,张艳茹译,陈恒、王刘纯编,《新史学》第27辑,大象出版社2021年版,第99—123页。

③ 代表性论著有,大門正克編『昭和史論争を問う:歴史を叙述することの可能性』、日本経済評論社、2006年;邢科:《日本左翼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兴起》,《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张艳茹:《日本史学史上的“昭和史论争”》,《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高燎:《唯物史观与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演变》,《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杨力:《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祁建民:《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中日唯物史观比较》,《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张艳茹:《二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月刊》2023年第11期。

④ 张经纬论述了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概况,但各阶段学术继承与发展的综合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参加张经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